

孝感縣人民公社考察報告

經濟系調查小組

根据党委和系党总支的决定，为了配合总路线学习，我們經濟系的九位师生和生物系的三位同学，从1959年11月8日到14日，到孝感县实地考察了人民公社，听取了县、公社、生产队、生产小队各级负责同志的六次报告，与农民进行了四次座谈，访问了敬老院、托儿所、队办小学和公共食堂，参观了队办工业、环河改道工程和两个展览会。这次下乡收穫很大。如过去有位同志曾在全系会议上系统“论证”公社是“名存实亡”，是块“空招牌”，通过调查，事实驳倒了原来的看法，他说：“坐在家里越想越糊涂，下去一看越看越清楚。”另一位同志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党忘记了农民”，“统购统销以后农民生活越来越苦”，“公社不如高级社，高级社不如初级社，初级社不如互助组，互助组不如单干”，并且认为自己的观点是“绝对正确”的，是“客观事实的正确反映”。调查中他看到党对农民非常关怀，农民生活大为提高，感动得流涕。回校后他主动地在全系会上进行了自我批判。此外，我們小组还有几位同志在人民公社问题上曾存在大量糊涂的、甚至极端错误的看法，这些看法在这次调查中也得到了纠正。通过调查，我們的眼睛擦亮了，事物看得清楚了，正如一位同志所说：“现在愿意高呼人民公社万岁。”

一、人民公社成长的过程

有人说：“人民公社是少数人盖起来的，缺乏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不符合群众要求，办早了。”我們调查所得的材料证明，这些非难是毫无根据的，与事实相违背的。公社办得很及时，是广大群众的要求，而且它本身就是千百万革命的劳动群众的伟大创造。孝感县朋兴公社诞生的历史过程就是一个铁证。

在孝感县中部地名叫赵家塆的地方，1952年土改后成立了互助组，冬天转入了初级社，1956年成立了高级社，取名长风社。几年来的互助合作运动，教育了农民，使他们懂得必须组织起来，集体进行生产，才能迅速摆脱贫困，走上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正如他们当时所说的：“合作合作，干劲十足；单干单干，两眼干看。”公社化运动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开展起来的。

高级社成立后，更充分发挥了群众的积极性，生产有了迅速发展。随着生产的发展，开始出现了一些矛盾。例如，要迅速提高社员生活，光靠种粮食不够，还须搞多种经营，但高级社却很难办到。1956年长风社曾买回三千棵果树，想搞果园。可是，社小地少，找不到一整块适合栽果树的地方，没办法，只好把树苗分给社员栽到各人院里去。由于没经验，又不能统一照管，结果只活了30株。果园没有搞成，养鱼总是可以的吧！社里派人去学养鱼，学成回来，技术很高明，一下就养殖了十万尾鲤鱼。但光有鲤鱼不成，还得有草鱼青鱼分层饲养才长得快。这些鱼苗要到长江去捞，可是社小，没有钱，又抽不出人，这样，养鲤鱼也就没大益处了。社长官木坐只好向养鱼的技术员说：“夥计，菩萨是灵，就是庙小了，你还

是回来种地吧！”养鱼不成，喂猪总应该不成问题吧！社里也的确喂了一些猪，但猪种不好，出肉率不高。想买“约克夏”，买不起，要1,300元一头。后来官木生到杭州参观，别人送了一对。欢欢喜喜带回来，不幸母猪很快死了，只剩下一头公猪。“约克夏”要吃粮食，社里母猪又少，喂这样的种猪不划算，只好杀掉。搞短途运输吧，社小，作物单纯，错不开季节；农闲有人干，农忙抽不出人来，别人不愿订合同。长风社各种门路都试过，结果落得一塌空。道理很简单：“庙小了”。

总路线提出后，大大鼓舞了群众。出现了一个生产大跃进的高潮。当时大搞深耕，可是用牛耕不深。没办法，白天让牛耕，晚上人来挖。160人挖六个晚上才挖了五亩田。这时大家更感到拖拉机的重要。于是七嘴八舌地在月夜里算起账来：一台拖拉机值六条大水牛，但可顶十条大水牛用，而且每年还可节省七万斤草料、一千多个喂牛和耕作人工。越算越合算，但就是买不起；即使买一台也没路可运来，运来了也没技术员；而且地也少，多数时间也会用不着。想来想去，要用拖拉机，要实现机械化，就只有公社。正是在大搞深耕的时候，群众要求公社的呼声更高了。

长期以来赵家堤只有一条三华里长的弯弯曲曲的小路与朋孝公路相联。到成立高级社后，运肥送粮也多了，特别是1958年购进很多肥料，全靠肩挑，既花工，又辛苦，因此他们想把小路加宽通马车。但这样要占用金星社的田。商量了好久，金星社的干部同意了，他们高高兴兴地干了一通宵，把路加宽了。但第二天路被金星社社员挖毁了。他们去讲理，并表示愿意出钱买占用的田，但金星社社员不同意，因为地少了，剩余劳力没出路。社员们说：“金子嫌黄了，银子嫌白了，金银不能长庄稼。”买田不成，他们又提议换田，金星社社员仍不同意：“远田远地不富人，黄金难买膝下土”。路修不成，只好仍用肩挑。

1958年大旱，长风社苦战了七、八个昼夜，修了一条二、三十里长的小渠，把一个水库的水引来灌溉。渠成了，来的水很少。为什么？因为沿途被别的社挖走了。那些社的社员说：“你们引水为了救禾，现在水打我们田边过，我们让禾干死吗？不让我用，你们搭天桥过水。”群众急得没办法，一个劲埋怨官社长，说：“早叫你把他们合进来，你不合，合进来就听你领导，就没有这些麻烦了。”

这样的小矛盾多得很，大跃进后经常出现，不仅长风社有，每个高级社都有。所有这些矛盾构成了一个大矛盾，那就是：高级社的小范围已经不适合生产的大发展了。这个矛盾本身就反映出公社化的物质基础具备了。也正是这样一个矛盾，使广大群众迫切要求办大社，办联社。去年七、八月间，长风社已经与附近四个社并成了联社。他们还要扩大，有的区干部却不同意，说：“大了难领导，办坏了谁负责？”正在这时，毛主席提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农民听到后欢欣鼓舞，奔走相告，都说毛主席看透了他们的心。他们批评那些怕社大了会办坏的干部说：“毛主席老早说过，不要象小脚女人一样走路，你们又是这样。”群众立即动手写申请书，并用几辆板车载着五、六十万分申请书涌向孝感县城，要求立即办人民公社。为了不挫伤群众如此高昂的革命积极性，中共孝感县委答应了群众的要求，决定办人民公社。

朋兴人民公社成立那天，成千上万的群众打扮得整整齐齐，玩狮子，舞龙灯，锣鼓喧天。有个74岁的官道真老人硬不肯留在家里看守牲畜，他向队长说：“队长，这次不能听你的分工。我七十多岁从未见过这样的喜事，二、三十里路，走不去，爬也得爬去。”开会

后，队长問他累不累，他說：“不要紧，我愈走愈有勁。”的确，广大农民入了公社后，奔头更大了，干劲愈来愈足了。請听他們对公社的歌頌：

过去望天堂，不知在哪方，
求神又拜佛，叩头又燒香。
如今入公社，公社胜天堂，
感謝毛主席，感謝共产党。

千百万劳动羣众是多么迫切地响往着人民公社！可見，右傾机会主义的“搞早了”的謬論，不仅不符合事实，而且还是一种打击广大农民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革命积极性的理論，是一种資产階級反对社会主义的反動理論。可是，我們也还有一些書呆子，看不到或不愿去看生产中出现 的矛盾，荒謬地把生产力与生产工具完全等同起来，引經据典，神气活現地宣称：“生产关系跑到生产力的前面去了。”这样，他們就为資产階級反動理論作了“理論”註釋，从而使自己成为資产階級代言人。这些書呆子忘記了或根本不理解馬克思的一句名言：“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当它所藉以存在的那些物質条件在旧社会胞胎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 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正是 生产关系必須适合 生产力性質这一客觀規律的体现，是合乎历史发展規律的，是我国农民要求迅速发展农村經濟、改变农村貧穷落后面貌的一个偉大的羣众运动。这样的运动，不是什么人喊一下就会出现，也不是什么人反对一下就会垮台的。

二、人民公社“办糟了”，还是办好了？

人民公社是“办糟了”，还是办好了？

根据我們所收集到的不全面的材料看来，人民公社在短短的一年中办了七件大事，而这七件大事都是高級社所不能 办到或不能完全办到的 天大的好事。人民公社办得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

第一件大事：战胜大旱災，獲得大丰收。

1958年孝感县虽然遭受到60余天的大旱，粮食产量仍出现了特大跃进，单位面积产量达到1,101斤，比1949年的370斤增长297.5%，比合作化后1956年的856斤增长128.6%。1959年，即人民公社成立后的第一年，遭受到百年来从未有过的特大旱災，80来天滴雨未下，河水几乎断流。但由于有了人民公社，仍取得了大丰收。早稻和中稻（晚稻脱粒未完）的总产量和单位面积产量比特大跃进的1958年增长10—15%，这雄辯地說明了人民公社的巨大优越性，說明了人民公社不是办“糟”了，而是办好了。

常言道：不怕不識貨，只怕貨比貨。历史是最好的見証人。70岁的老农王望成回憶說，甲子年（1924年）是解放前最大一次荒年，50余天沒有下雨，孝感一帶赤地千里，粮食顆粒无收；路断人稀，雞犬无聞；多少人妻离子散，多少人家破人亡。王李家灣37戶，除一戶地主外，全部逃奔他乡，乞討度日；夏家灣33人，除6个老人外，其余也全部出外逃荒，一个名叫舒登元的农民，出外不到两月就餓死了，跟他一起逃荒的妻子改了嫁，五个孩子送給了別人。王望成自己也帶着妻子和三个儿子逃到应城，一連七天一顆米也未吃上，全靠野菜充飢，全家餓得无力支持，寸步难行，只好忍痛卖掉了一个儿子，換得一袋粮食。直到現在，当人們一提到“荒年卖儿”的时候，王老人还会失声痛哭。今年旱情远远胜过甲子年，但仍

然獲得大丰收，各家老少团聚，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今昔对比，农民怎能不歌颂新社会，怎能不歌颂人民公社！自然灾害对农民是多么严重的威胁，而能战胜自然灾害，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有人会问：难道高级社不能抗旱吗？能，它比单干户和初级合作社有很大优越性，但是人民公社却有更大优越性，它的抗旱威力是高级社望尘莫及的。过去高级社最多能组织几百人抗旱，而现在人民公社却能组织上万人的抗旱大军，完成过去不敢设想的艰巨任务。例如：朋兴公社在一昼夜间筑成了一条长140公尺、底宽40公尺、面宽12公尺、高4公尺的拦河大堰，截水灌田几千亩。公社不仅人多，而且经济力量雄厚，今年抗旱就出动水车五千部，抽水机五十二台，拖拉机11台，群众说摆下了“龙门大阵”。为了救活山上的庄稼，有的地方用黄桶架成天桥引水，有的地方用几百架水车联成一条水龙，农民看到非常感动，一个姓胡的农民说：“抽水机真是好，半天云里架天桥，库水翻山岗，禾苗迎头笑。”五一队一个老农说：“老汉活了七十三，未见河水上高山；谢谢党的好领导，人民公社胜过天。”的确，“人定胜天”这句壮言豪语，人民公社已有可能完全使它变成现实。

公社之所以比高级社优越，还因为公社可以在更大范围内调配劳力和调整土地，从而易于解决抗旱、兴修水利中的各种矛盾。高级社时，国家曾投资41万元，修成八汉洼水库，但因开渠会占用水库附近各社的部分良田，遭到他们反对。公社成立后，组织了四千劳动力，苦战一月，挖成长达70余华里的大渠道，保证了三万五千亩田获得大丰收。今年朋兴社灌了七千个塘，放尽了四个水库的水，如果不是修成这条渠道，这几万亩田是很难丰收的。这条水渠修成时，有几个老人坐在渠边谈了一个通宵，其中一个老人把他们谈话的内容和感受概括为四句话：“三十里长渠喜水道，水旱作物点头笑；不是人民公社化，千想万想难想到。”农民在战胜旱灾的过程中，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公社比高级社有更大优越性，更加坚决地把自己的命运同公社的命运联系起来。公社在严重的自然灾害威胁下没有垮台，反而更加强大，更加巩固，更加得到人心，这再次证明公社不是“蒸”起来的，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

第二件大事：农业生产全面发展。

人民公社解决了高级合作社在发展付业生产时所难以克服的矛盾。公社地大，各生产队作物不同，农时季节不一，常年可以在不影响农业生产的条件下，抽调各生产队的劳力搞付业，并还可以组织专门的林业、渔业、畜牧业、付业队伍，大搞多种经营。朋兴公社就配备了100多人的林业专业队和120人的渔业专业队伍，今年还抽调了50人到长江捕捞了200万尾鱼苗。长风队那位养鲤鱼的技术人员也归了队，不再感到英雄无用武之地了。此外，公社还开闢了果木场，栽种了一万三千多棵树苗。在发展多种经营方面，公社采取了先公后私、公私并举、全面发展的方针，大力发展家禽家畜、水产、蔬菜、瓜果、林木、茧麻等等，其中除水产无私营外，其余都采取社、队、小队与社员层层经营的办法。

发展付业生产更加提高了社员的生活。长风队一、二小队每个劳动力每月付业收入就达六、七元，而且小队食堂每月还可杀猪食用。

第三件大事：大办钢铁。

人民公社刚一诞生，马上就投入大办钢铁运动。公社组织了上千上万人的劳力大协作，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并且解放了妇女的劳动力，从而保证了在秋季大丰收中能抽出大量劳动力上山炼铁。大办钢铁第一次显示出人民公社巨大的优越性。

孝感全县在大办钢铁以前，只有几十个人淘点铁砂，炼瓦沟铁，制几口锅，一年最多生产七吨铁。1958年公社化后，全县组成了20万人的钢铁大军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内，从无到有，共炼出了三千二百六十吨生铁，三百八十吨土钢。

这些钢铁，如果没有人民公社，不搞群众运动，按历史上最高年产量七吨计算，得五百年才能炼成，就是拿五十万元造两座洋高炉，也得一年半时间才能炼出来。除了支援国家1180.5吨铁和18.8吨钢外，余下部分制造了2300部犁，1142部打穀机，65台小钢磨，143吨机械零件、配件和水利交通工具，节省了四十多万个劳力，有力地推动了工农业生产大跃进。此外还修配了80台抽水机，在抗旱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大办钢铁还训练了两万多炼焦、炼铁、选矿的工人，节省了训练费48万元，查出了矿藏34处，节省勘探费用6万5千元。

通过大办钢铁，农民养成了大协作、大兵团作战的习惯，并且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培养了共产主义风格。

人民公社大办钢铁，不管算经济账还是算政治账，都是所得极大，并不是得不偿失。毫无疑问，大办钢铁是人民公社史上的光辉的一页，是人民公社所立下的第一个汗马功劳。

第四件大事：大办工业。

群众说：“有了公社化，工业大变化。”事实的确如此。随着生产的发展，农民日益感到自办工业的必要。比如过去急需的步犁等农具，往往不能按时得到充分供应，抽水机坏一个螺丝钉也得跑到汉口装配，既不方便，又耽误生产。公社成立，有了雄厚的资金，也能抽出人从事公社工业生产。朋兴公社成立后就创立了机械厂、钢铁厂、拖拉机站、修配厂、肥料厂、砖瓦厂、缝纫厂、制鞋厂、押花厂、草包厂等十余个工厂，生产了225万多斤土化肥，17,730吨焦，16000斤油，七台车床，一台刨床，八台摇鑽，1290部单铧犁，350部条播机，25000多付中小型新农具，收入120多万元。今年他们还准备投资十万元建立新厂。同时，公社也从物质和技术各方面帮助生产队建立工厂，如长风生产的铁工厂就是在公社从另一个队调来的一个老技术工人的辅导下办起来的。黎明生产队也在公社帮助下建立起五个工厂，其中的电米厂每天出米一万两千斤，每天节省劳动力一千个，每月收入一千元；砖瓦厂每月制砖六千块，每月收入一万三千元；铁木厂每天可修农具20件，每月可收入300元；缝纫厂每月收入550元。

大办工业增加了农民收入，而且使他们“吃的机制米，穿的机制衣”。但更重要的是有力地支援了农业生产。这些小厂比大工厂更及时地、因地制宜地帮助农业解决问题。每逢播种季节，它们总能迅速地供应步犁、条播机等各种急需农具。现在许多地方作到小修不出队，大修不出社，坏个螺丝钉不会再跑到汉口来了。今年抗旱紧张，抽水机用的柴油，国家供应有限，朋兴公社八一炼油厂炼出322吨柴油，及时供应，对抗旱起了巨大作用。人民公社大办工业的深远意义还在于加速了国家工业化进程，加速了农业机械化进程，加速了缩小城乡差别的进程。

第五件大事：加速了农业机械化进程。

使用机器生产是高速发展农业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农民千百年来愿望。不用说机器耕田，能实现机器抽水，在他们看来，也是一件难以想象的天大的喜事。长期以来，在孝感农村流行着这样一句话：“种田不车水，赛过活神仙。”从这句话也可看出他们是多么追

切地希望实现农业机械化。公社成立，他们的梦想已有可能变成现实，正如长风队的社员所说：“过去高级社时，除非我们一年不吃不喝，积下来的钱才能买到一台拖拉机。现在只要每人拿一角钱，公社就可增加一台拖拉机。”的确，有了公社，什么事情都可逐步实现了。象朋兴公社一成立就购买了四台拖拉机，一部汽车，二十一台抽水机。全社使用拖拉机耕田一万六千亩，节省了人工、牛工四千多个，平整了土地二万七千亩。很多高低不平的土地，千年未动的田埂，都被拖拉机联成了一片辽阔的平原，扩大了耕地面积二千多亩。随着生产的发展，公社的力量也日益雄厚，目前公社已建立起了拖拉机站，共拥有拖拉机25混合台，843匹马力；其他动力机械27部，511匹马力；汽车一部，联合收割机一部。就全县来说，公社化也促进了农业机械化的大发展。在公社化以前，全县只有拖拉机2.66标准台，现在发展到52.42台，机耕面积由4226亩扩大到104840亩；抽水机由95台发展到213台。没有人民公社，是不能发展得这样快的。尽管现在还未实现机械化，有了公社，实现机械化就不是什么遥远的事了。

公社成立以后，统一调整土地，动员劳动力，修筑公路。朋兴公社一年来修成36条公路，长达65里。现在交通四通八达，拖拉机可以直接开到每个生产队。此外还修了无数条大路，仅朋兴公社在一年中就修了200多里大路，并拥有700多辆大胶轮车。现在较远的运输已不再用肩挑。农民歌颂说：

人民公社真正好， 千年的理想实现了，
一条小路变公路， 无数的车马代肩挑，
从今不出吐血佬（压伤），人人长命寿年高。

第六件大事：加速了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进程。

目前公社实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是以队为基础的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三级所有制，今后将过渡到以社为基础的所有制，从而为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打下牢靠的基础。以队为基础的根本原因之一是还存在穷队和富队的差别。公社成立后，各队之间关系发生了变化，富队愿意支援穷队，公社本身也能从人力物力加以支援，因而穷队社员有决心也有干劲改变自己的落后面貌。据统计，一年来孝感县已有72%的穷队赶上了富队，其余穷队正在迅速地赶上富队。可以设想，在今后短短几年内，各个生产队的富裕程度会大体一致，那时，公社的所有制就将转变为以社一级为基础了。而当这点实现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迄今尚未解决的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即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问题，就将很快地在实践中得到解决了。

第七件大事：大办食堂，解放了妇女的劳动力。

我们参观了长风生产队第一小队的食堂（现在全小队42户211人全入了食堂），并在那里吃了一顿饭，饭后与小队干部座谈了两个钟头；第二天我们又和食堂的几个妇女一起座谈了一次。这个食堂是在大跃进时成立的。当时农民在总路线的鼓舞下，掀起了生产大高潮，感到劳动力缺乏，妇女更感到受家务劳动的束缚，因此迫切要求成立食堂。1959年四、五月间，吹来一股歪风，要解散食堂，可是群众坚决不同意。有个姓池的妇女说：“喝口水也要在食堂喝，死也要死在食堂。”这个“棒打不散”的食堂，正好证明食堂是广大群众所要求的。

食堂的好处在于能抽出劳力，发展生产，改善生活。这个食堂供水、压面、切菜等实现

了半機械化，只要一個半勞動力就能保證 211 人按時用飯，這樣就可抽出勞動力從事農付業生產。1959 年付業收入就有五千元。同時生活也大大改善了，一年來吃了 2,200 多斤豬肉，相當於過去三年半所吃的總和，吃魚 3000 斤，吃糯米 2000 多斤，雞蛋無法估計。例如國慶節每人吃 12 兩豬肉，半斤魚。過中秋吃的月餅也是食堂拿錢買的。在食堂吃飯也很方便，自己的菜可以叫食堂幫助做，願意拿回家吃也可以，家里小鍋小灶仍舊保留。此外，辦了食堂，還便于開會，便于學文化。

但是，食堂的重大意義還在於解放了婦女的勞動力，所以它特別受到婦女的歡迎。婦女在過去有這樣的話：“男家生得丑又丑，總在人面前走；女兒生得乖又乖，總在灶門前鑽。”這表明了她們熱烈嚮往擺脫家務勞動，參加社會生活。食堂成立後，她們的這種願望實現了。而且她們由於參加了生產，經濟上獨立了，家庭關係也和睦了：“過去一天三吵，現在一天三笑”。

有人說農村婦女怕搞田間勞動，所以不歡迎食堂。很明顯，說這種話的人，是把資產階級太太小姐的心情強加在勞動婦女的身上，是對勞動婦女的一種污蔑。只有具有勞動人民感情的人，才能懂得辦食堂是一件多麼了不起的好事。

綜上所述，人民公社在短短一年中已顯示出她巨大的優越性，辦了七件天大的好事，給農民帶來了顯著的利益。可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偏偏要說是“搞糟了”，真是不同階級有不同的語言。請問這些說人民公社搞糟了的先生們：難道公社戰勝了旱災，確保了丰收是搞糟了嗎？那末，是不是要讓甲子年的歷史重演，讓農民離鄉背井、棄兒賣女、餓死他鄉才算不糟呢？難道全面發展生產、大搞多種經營、迅速提高農民生活是搞糟了嗎？那末，是不是要限制生產發展，使農民處於貧困狀態，甚至回到過去“破衣麻袋當被蓋，糠糠野菜半年糧”的日子才算不糟呢？難道大辦鋼鐵、大辦工業、大搞機械化是搞糟了嗎？那末，是不是要農民繼續使用落后的工具象牛馬一樣地進行繁重的體力勞動以至生產不發展、生活不改善才算不糟呢？難道大辦食堂、解放婦女的勞動力是搞糟了嗎？那末，是不是要繼續束縛婦女的勞動力、壓制她們參加社會活動的積極性才算不糟呢？難道幫助窮隊趕富隊，促進集體所有制更快地轉變為全民所有制搞糟了嗎？那末，是不是要將革命停頓下來、甚至倒退回去才算不糟呢？事情很明白，所謂“人民公社搞糟了”的謬論，實質上是反對農民改變一窮二白的狀況、是反對農民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一種反動的資產階級思潮。

三、農民生活提高了，還是“降低”了？

有人說：“合作化後，特別是大躍進和公社化後，農民生活降低了。”根據我們調查所得的材料，說明這又是一個彌天大謊。人民公社實行工資制與供給制相結合的分配制度，使貧苦農民的生活得到基本保障；人民公社開始逐步實現生產的機械化，交通運輸的大路化、車子化，使農民從繁重勞動中逐漸解放出來；人民公社的文教衛生及公共福利事業也有了巨大發展，社社有中學，隊隊有小學，各隊還舉行了衛生所、婦產院、幼兒園、托兒所、敬老院等公共福利事業，所有這一切無疑地標誌着公社化後農民生活有了很大提高，農村面貌發生了巨大變化。這裡，我們僅就兩個灣子的變化來談一談。

祝港公社有個汪家灣，有 26 戶 114 口人。最近在總路線學習中，他們來了個今昔八比：

(1)比社会:过去国民党统治,十多种苛捐杂税,每年剥削去约888元。解放后,国家给他们生活、肥料、种子、耕牛等二十余种贷款,每年得到1,300多元;(2)比生产:解放前亩产364斤,1958年亩产1,150斤;(3)比建设:解放前八口小塘,名叫“一早乾”,公社化后修了个小水库,并把八口小塘改成了八口大塘,保证了今年大灾大丰收;(4)比生活:过去51人在外讨饭,七户做长工,一户卖儿女;现在家家有吃有穿有余粮。解放前全湾只有一件卫生衣,现在增加到50件,胶鞋由四双增加到34双,热水瓶由两个增加到27个,抽纸烟的过去只有两个人,现在25个人。有个78岁的老农,解放前经历了24个荒年,逃荒24次,只是在解放后迁到荒年才没有逃荒,全家团聚,不愁吃穿;(5)比文化:过去98人中只有8人认识几个字,只有4个小孩读书;现在34个成人识字,28个小孩读书,其中高中生和初中生各一人;(6)比卫生:过去大人小孩难过三关(瘧疾、痢疾、天花),有一年26户有小孩的人家就死了九个小小孩,现在三关全解决了;(7)比当家:过去地主当家,现在自己当家;(8)比远景:过去度日如年,现在越过越甜,明年每户收入要到一千元。这是农民自己作的对比。那些出身农民而叫“搞糟了”、“太苦了”的人,应该也来个今昔对比,不要忘了本,不要象农民所说的:“好了疮疤忘了痛”。

再看赵家湾的变化。解放前这里90%的土地被地主占去,在地主残酷剥削下,35户中贫农在一般丰收年景时冬春也有27户断炊,5户在外讨饭。全湾有18户靠卖长工苦度时光。当时流传着这样的歌谣:

赵家湾, 赵家湾,
富的富上天, 穷的穷光蛋;
荒年富户穀满仓, 丰年穷人受飢寒。

解放后,这种苦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农民生活连年上升,现在仅就农民每户收入的增长情况来说明。1949年即解放前一年,每户收入是80元,1953年初级合作社时是120元,上升了50%;1956年高级合作社时是163元,比解放前增加一倍多,比1953年增加了大约36%。1958年是特大跃进的一年,生产大发展,收入也大增加,这年是452元,即比解放前提高了五倍多,比1956年的高级合作社时也增加了2.8倍。可以看出,1958年的大跃进绝不是甚么虚吹的,收入提高两倍多就是一个铁证。1959年即公社化的第一年,虽然碰到近百年未有过的大旱,仍确保了丰收,农民收入将达709元。这就是说,公社成立的第一年,就使农民的收入比特大跃进的1958年又提高57%。

公社化后农民收入的增加也反映在他们这一年来所添购的物品上。我们调查了一户七口之家的贫农,一年来买了:被里、被面、床单各三套,衣服27件,灯草絨褲一条,絨衣8件,胶鞋6双,半长統雨鞋4双,热水瓶3个,手电筒4个。又朋兴社五星队在1958年有热水瓶6个,1959年增加到122个;胶鞋1958年16双,1959年384双;絨衣1958年6件,1959年92件。可见,那些“大跃进降低了农民生活,公社化后农民生活更苦了”的议论,纯粹是毫无根据的捏造。

此外,解放后每人口粮也是逐年增长的。今年原定口粮550斤,相当于“放开肚子吃饭”的1958年实际吃掉的口粮数。后来为了支援重灾区 and 城市人民,大家同意缩减为420斤,基本上可以吃饱。所谓“顿顿吃稀饭,每天二两半”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由于收入大增加,经常又能领到工资,农民再不愿卖猪、卖鸡换零钱花了。今年1至9

月农民每人吃肉平均已达10斤，这正是城市猪肉供应比較緊張的根本原因。那些因少吃几块肉而牢騷滿腹、怨气冲天的人，實質上是在反对农民提高生活；可是，叫嚣“农民生活太苦”的也正是他們，这說明什么问题呢？說明这些人并不真正關心农民，他們是伪君子，假善人。

当然，我們不是說农民生活已經很好了，而是說随着生产的发展，农民生活在年年提高；大跃进和公社化后，农民生活有了显著的提高，今后还将有更大的提高。在党长期教育下的农民，是不断革命論者，他們并不滿足于已有的成就。現在农村出現的大跃进的新高潮，正是这种不断革命的偉大意志的体现。

孝感县正在掀起翻一番的运动，1960年的口号是：耕地翻一番，（由105万亩）达到两百万；产量翻一番，每人粮两千；收入翻一番，每户一千元。今冬明春还要大兴水利，使灌溉面积由現在的84万亩增加到180万亩（其中旱地60万亩），要在全县形成以四大水系为中心的“长藤結瓜”式的完整的水利灌溉系統，使120万亩水田全部自流灌溉，使90%以上的耕地面积达到百日无雨保丰收，日雨量200公厘不漬不澇，实现“土地丘陵渠网化，湖区堤垸河网化，荒湖变良田，高山成綠洲，灌溉成自流，年年大丰收。”

农民正以冲天的革命干劲去实现这一雄偉的规划，例如孝感县过去规划两年开荒20万亩，現在半个月即已完成了。毫无疑問，1960年将是一个特大跃进的一年。我們文教事业應該跟上去。我們应象农民一样，鼓足干劲，掀起一个教学、科学研究和生产劳动全面大跃进的新高潮。

（1959.12）